



告別 二次之後

周耀輝的散文作品《紙上染了藍》，得到了2015年第十三屆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散文組推薦獎，成為這位1989年開始不斷創作歌詞的作詞人，於歌詞範疇以外的文學獎項。身為文學創作界別的新人能夠獲得此獎項，同時體現了自己有能力跨越流行文化如歌詞與精緻一點的文學如散文小說之間的分野，周耀輝表示「十分開心」，但想了想，又覺得「開心」這個形容詞不夠貼切，畢竟《紙上染了藍》所寫的是周耀輝的媽媽。

「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留下了很多東西，但當中有我。我寫這本書有種奢望，去證明我媽媽一生沒有白過，透過文字去告訴這個世界她存在過。我寫書、出版、得獎，我媽以這個方式存活於世的可能又大了些。她在天有靈，應該會欣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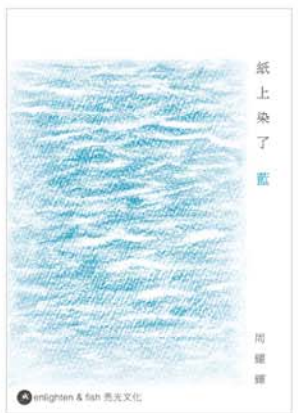
撰文：黃世鴻 攝影：陳亮華 部分相片由亮光文化提供 美術：廖智森



在周耀輝眼中，媽媽是個因要獨立照顧一對子女而被迫堅強的女人。



周耀輝的爸爸在他小時候就離開了他與媽媽及姐姐，到了加拿大另組家庭。小時候每兩個月，周爸爸會寄家用回來香港。周耀輝認為是他表示自己盡了責任的行為。



藍色的約定

《紙上染了藍》這本散文作品，是周耀輝的約定。「我媽媽2010年過身，當時將要出版的新書《突然十年便過去》還欠一個序。那時我覺得我媽就是我的序，所以就以她的事作為序的內容。寫了3,000多字，意猶未盡，但始終是個序，為免喧賓奪主就停了。」周耀輝有個習慣，創作前要在紙上寫下筆記。這篇序亦一樣，將回憶中可以想到與媽媽有關的事都寫下來，放於牛仔褲內，回家將筆記拿出來時，已被染上了一片藍色。「紙上染了藍」順理成章成了序的名字。「這是個染了藍色的約定。我答應了我媽媽，要寫她。」

事隔一年多，文化雙月刊《字花》邀請周耀輝寫專欄。「寫歌詞有死線，我習慣了被人催逼，所以我知道時間愈過，就愈不會開始寫我與媽媽的事。」所以周耀輝藉這機會，以專欄形式，分十二期，總共兩年時間去完成自己對媽媽許下的諾言。

「每篇我都會用兩至三日的下晝時間，坐下來，很安靜，很集中，很尖銳地去寫。」周耀輝以那部分染了藍的筆記為基礎重喚回憶。「記憶這回事很奇怪，就像釣魚。你只要坐下來迫自己去回想，像掉個魚網到水中，會勾起很多本來沒有記起來的事。不過記憶不可靠，我僅有記憶去書寫，再問姐姐及其他家人去印證，當然他們的記憶也可能是不可靠的，不過我就是想寫下這些事。」



《紙上染了藍》(2014)本來是周耀輝另一本作品《突然十年便過去》(2010)的序的名稱。當時周耀輝的媽媽剛去世不久，他就以媽媽的事作為序的內容。兒子的序就是母親。

每一次告別

雖說回憶不可靠，書中有部分更是周耀輝小時候的事情，但卻寫得非常深刻：周媽媽把着小孩時代周耀輝的手，教他寫字，就連力度、溫度，以及媽媽在手背上留下的汗，都有寫到。也許書寫這件事從小到大在周耀輝心中都有一種特別意義。「寫這十二篇專欄時，心情很複雜。每次寫，都像還魂，覺得我媽媽回來與我在一起。我很開心地像回來與我一起生活，寫作的過程可以幫我暫時離開現實，忘形地去到另一個時空。但每寫完一篇，就像再說一次再見。離別是痛苦的事，但我還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召喚她回來，是件好事，令我可以繼續寫下去。」十二篇寫完，結集成書。「在荷蘭的朋友問我這本書有否英文名，我回答說是Long Long Farewell。無盡的告別，總比決絕的離去好得多。」

周耀輝在書中形容長大後與媽媽分開睡，是第二次割斷臍帶。31歲時，周耀輝愈走愈遠，離開香港到荷蘭生活19年，這可能比割斷臍帶更決絕。「我媽於2010年過身，2011年我回港生活。」周耀輝趕不及見媽媽最後一面。「有時我會想，如果我沒有離開香港會怎樣。但我不會讓自己可惜太多，因為可惜也沒有辦法追回時光，惟有從容面對。」



《紙上染了藍》有一段落如是說：「銀鏡，我應該很早已經不戴了，可能是中學吧，覺得老套，況且是媽媽的牽繫，繫在手。哪個中學男生還牽着媽媽的手？可我胸前的玉釧卻是掛到年紀更大了。」1961年出生的周耀輝，快要滿54歲，沒有掛玉釧，重新穿上小時候的銀鏡。

「那時候我只知道想離開香港。第一是因為我讀的是英國語文及比較文學，很想到歐洲去看看；第二是因為當年大家都關心的97回歸暗湧；第三是我當時除了在商台、明報工作之外，還要填詞。三樣都是我喜歡的工作，我自覺也做得很好，但真的太辛苦。加上遇到感情問題要作出抉擇，所以最後決定到荷蘭生活。現在我能夠仍然自由地生活，要感激我媽當年沒有阻止我去荷蘭。其實由讀書、工作、離開香港，我媽都沒有阻撓我的決定，可能因為她都曾經是離家出走、離經叛道的少女。」



周耀輝最近書籍作品《一個身體兩個人》(2015)，以短篇小說為作品形式。周耀輝希望嘗試新的文體。「我寫過以真實事件為基礎的散文，以虛構事件為題材的短篇小說，歌詞有點像新詩，可能下一次我真的會以真實題材的長篇小說為作品形式。」



周耀輝的歌詞創作被評為光怪陸離，取材偏鋒。《假如我們什麼都不怕》(2012)，以人類各種恐懼症為題材寫作短篇散文故事，真假難分，與歌詞取向一脈相承，古怪有趣。



周耀輝現為浸大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教學生歌詞創作。訪問當日適逢畢業典禮。「我2011年接受了浸大的教席，回港教書，任期20個月。當時想想，也多年沒有回到香港，就趁機會回來看看，怎知一留就是四年。其實當初到荷蘭也沒有抱着移民的心態，但一待就是19年。」

坦誠面對自己

這位少女的後半生，就被兒子從他的角度被記於書中，包括了被丈夫拋棄後獨力養大子女二人的種種。對於自己與媽媽的事坦蕩地展露於讀者面前，周耀輝認為別無他法。「我承諾了要做，就要誠實，誠懇去做，不可以半生不熟。要表達出我一生人感受到的媽媽是怎樣的人，其他都是次要。現時我在浸會大學教學生創作歌詞，他們很多人都習慣坦誠去面對世界及自己，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坦誠面對自己，但創作就要這樣。坦誠地寫作對我來說，是喜悅的來源，是覺得自己存在的方法。透過這本書，讀者就好像認識了我媽媽，就如你一直稱呼她為auntie，這個關係也着實不錯。」

問周耀輝為何以散文形式去寫與auntie之間的事，他笑說自己也是直至文學雙年獎公布得獎名單，《紙上染了藍》在散文組得到了推薦獎才知道自己寫的是散文。不過周耀輝就確切地提過要寫一篇小說，開首要寫一個兒子出席爸爸的葬禮，抒發他對爸爸拋棄母親的憤怒。「今次文學雙年獎對我是個獎勵，更是催逼。因為11月26日的頒獎禮以及這個訪問，我有想過是否要將這本書寄給他看看。」《紙上染了藍》的後記，寫到周耀輝與絕少往來的爸爸，於2014年，auntie過身4年後，通了個罕有的、接近半個小時的長途電話，之後再沒有聯絡。「他在世與否我都不知道。」周耀輝說明白有些事終究都要去做，可能只欠一點催逼。



每年創作班的學生都會合力籌辦一個演唱會，邀請歌手為他們演譯他們的歌詞，圖為演出的相關海報。周耀輝向記者介紹演出時一臉滿足。